

中央情报局

1981—1987

秘密战

〔美〕 鲍勃·伍德沃德



●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中央情报局1981—1987 秘密战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蔡建勇 田立宪等 译
叶长然 校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中央情报局1981—1987秘密战

〔美〕 鲍勃·伍德沃德 著

蔡建勇 田立宪等 译 叶长然 校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9.5 字数，460千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书号：ISBN7-5047-0064-9/I·0002 定价：5.00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为主线，用纪实的体裁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该局从1981年到1987年的秘密情报活动。作者鲍勃·伍德沃德现任《华盛顿邮报》副总编，是一位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同凯西交往甚密。为了撰写本书，他亲自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与凯西本人面晤数十次之多。本书引用了许多尚未公布于世的秘密文件，披露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此书刚一问世，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凯西是里根1980年竞选总统时的竞选活动组织人，里根上台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至1987年去世。从里根执政以来，他一直帮助里根政府制定对外和秘密活动的政策。华盛顿赋予他的权力超过了任何一届中央情报局局长，使他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秘密活动总设计师的角色，大大地加强并扩大了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势力范围。

本书以卡特政府企图从伊朗夺回人质遭到失败、中央情报局局长走马上任拉开序幕，以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为主要舞台，把华盛顿权力中心的关键人物作为主要角色，以这几年来美国的重大外交及军事活动为主要场景，如尼加拉瓜危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伊朗门事

件、突袭利比亚等，展现了一幅幅交织着阴谋、欺骗、讹诈和暗杀的活生生的画面，使读者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是怎样影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还有施大本、佟玉民、刘波坤、李压西、彭训厚、苗月冬、杨平、胡显光、周贻荃、姜秀兰、朱大荣等，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因时间仓促，限于水平，翻译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11月

序 幕

闹钟唤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他从不喜欢早起，把闹钟定在了最后一刻——早晨7点。今天是1980年11月20日，是伊朗人质危机以来的第383天。52名美国人仍被扣压在德黑兰，吉米·卡特在这个月初不得不走下了总统宝座。今天，特纳要向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当面汇报情报工作。

年初，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郊外发现一些伊朗人用杀伤力很强的步枪进行射击练习，因此在特纳家周围一连几星期布置了全天24小时警戒。现在保安人员已经撤离，住宅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退休海军上将特纳今年56岁，正值盛年，踌躇满志。作为一名系统分析家、海军“思想家”和罗兹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总是极力摆脱日常事务，专心于重大课题的研究。但他毕竟不能超凡脱俗，当前正值总统换届，在这种新老交替的时期，他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首先，他要费心斟酌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把国家的真实机密告知里根，新总统需要了解那些带有极大危险性的秘密活动和间谍技术。那些位于秘密活动最低层的人员从来就没有透露给新闻界，苏联间谍对此也一无所知。情况汇报必须面对面进行，只能有他们两人参加，除非里根指明哪些人是可以信赖的。他不能把机密外露给里根身边帮闲的政客，前两次汇报时他们团团坐在里根周围，可以预料，这次

汇报时他们还会在场。特纳最终要向当选总统作出说明的一次最秘密的情报活动，牵涉到数百人，他们的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其次，他还需要引导里根来权衡秘密情报活动的长远利益与潜在风险，这才是一位总统真正做出选择的地方，里根已经答应重振情报工作。

特纳一直试图改变他内心对里根的印象。在前两次汇报时，里根显得十分热情，但实质上却难以接近。里根向特纳挥手告别时，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似乎二人情投意合，世界上不论出现什么问题，只须一声大笑，讲一个好莱坞的故事，或者宣布一条戒律，就可以得到解决。这和卡特那种过分严肃、近乎无情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与里根交谈的越多，就越怀疑里根的基本思维能力。他曾私下说里根是一个“愚蠢的家伙”。

特纳最后还要为他的未来着想。他还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要把这种愿望转告里根。里根和共和党的批评家指责卡特捆绑住了中央情报局的手脚，使它无法开展有效的谍报活动。共和党人还攻击说，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特纳过分热衷于卡特的人权运动，宁可白白错过大好时机，整天醉心于电子窃听和卫星侦察的 latest 技术，因为它们是完全的、被动的，相对说来是安全的。有人甚至说这个局“软弱无能”。特纳想，如果总统容他禀报，他会把这些人的不实之词驳得体无完肤。他的情报局执行的一些秘密行动，一说出来会使里根大开眼界的。

“里根不愿使我们这个局卷入政治论战，想使我们走上正轨，”特纳这样对他的高级助手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嘲笑他抱着继续留任的幻想。他在海军有一位老朋友，退休上尉

赫布·赫图，现在担任局里的公共事务总管。赫图认为应当帮助特纳面对现实。

“他们不会留你的，”赫图对他说，“不会的。他们花那么大的劲，就是为了把你搞掉。”

特纳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有时，这是很难做到的。总统大选来临之前，他召集了他的15名高级助手来到“梨园”聚会，局里的人都把这个地方叫做“农场”，它是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乡间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和一所学校的所在地。他半开玩笑地搞了一次模拟投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出了结果：卡特2票，里根13票。这恰好是里根在总统选举团取得的489票对44票的胜利的一个缩影。

大选后的第二天早晨令人难以忍受。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走廊里洋溢着一片欢喜之情。虽然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把头伸出窗外大声欢呼，以示庆贺，但在许多人眼里，里根的胜利简直就是巴黎解放日。

特纳冲了一个淋浴，穿好衣服，坐下来读一会儿书。他拿起了每周一课的基督科学教程。如果他现在不读上一读，那他今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基督教徒中的智者，无论是精神还是智慧都在他人之上。

这一星期的教义说：“……满怀深情告诉你的病人，他务必醒转。勿使他陷入困惑，走进歧途……要深刻自我反省。”特纳暗想，对于世界上最庞大、最老练的情报机构的头子来说，这种说法有点奇特。但他亲身体验过教义的力量。1920年，他父亲在股票投机中破了产，自杀身亡，母亲挣扎着活了下来。不久，他唯一的兄弟又在车祸中丧生。他恪守宗教信仰，从容对待无法解释的悲剧与痛苦。他拿起红笔，在“磨难是上帝的关怀”这句话的下面深深地画了一

道线。

没有时间了，他站起身来，今天的教程读不完了。特纳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结实健壮，迈着有力的步伐走下楼梯去吃早饭——“加点油”，他的助手都这么说。浓厚的灰发，常常在他行进时带出的气浪中微微飘动。浅蓝色的眼睛、神采焕发笑容、“扶轮”社的作派，这一切很难使人把他与CIA（译注：中央情报局的英文缩写）联系起来。

在餐桌上，他喝的是果汁和热柠檬水。基督教不准吃有刺激性的东西，不准喝咖啡。特纳甚至不喜欢可可冰淇淋的味道。

《华盛顿邮报》上的大字标题赫然写道：“据传凯西即将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一把抓过来了报纸。他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这种可能性。“凯西”是指威廉·凯西，现年67岁，里根的竞选运动主席。特纳感到这种选择简直是一种倒退，荒唐透顶。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的做法是，任命他的竞选运动管理人约翰·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难道CIA成了今年政治战中的筹码？

特纳接着往下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西在战略勤务局中工作，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认为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就象是让身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气横秋的将领去统帅现代化军队。在特纳眼中，战略勤务局是一帮老手拼凑起来的一个老式组织。这个局里残存的那些老家伙，他们带来的陈旧不堪的作风，至今在中央情报局占有一席之地，是特纳的一块心病。这些人都是些行动员，结成兄弟帮，成了局中之局。当白宫或者国会来找中央情报局的麻烦时，他们会对着你的脖子咬上一口，70年代中期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时，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些老手被保留了下来，因为

需要他们。每一位总统，每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需要有献身精神的秘密行动员来干那些不干不净的勾当。他们组成了一个无形的俱乐部，是秘密情报职业中的帮会。这种人很适应在隐秘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即便奖赏秘而不宣，也在所不辞。他们既是中央情报局的力量，又是它的弱点。现在，一位小兄弟从暗影里冒了出来。《邮报》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里，凯西负责向德国后方空投间谍。那已成为35年前的往事了。

特纳一直指望，他们会给他留点面子，在告知他将被取而代之以前，不会透露给新闻界。《邮报》上的故事也许是放一个试探气球，或者根本就是胡扯。在总统竞选之前，他压根就没听说过凯西是何许人物。两个星期之前，里根在作为当选总统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过，凯西将重操私人律师旧业。

下台的前景只能使特纳更加坚信，是他带领中央情报局闯出险关，渡过了70年代中期动荡不安的黑暗日子——那次惊变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余殃，国会的调查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阴谋暗杀外国领导人；用有生命危险的致幻剂在无辜的人身上做试验；不顾总统明令禁止，私下存放小量毒品和毒液；私拆邮件；对反对过越南战争的美国人实行跟踪、监视等等。他领着中央情报局走出了野蛮蒙昧的牛仔时代，一改被扭曲的神秘怪物的形象，向公众表明，这个局能够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即便是最秘密的活动也是如此。他指挥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是得到国会支持的。如果它们能被理解，那同样也会得到里根和美国人民的支持，对此，他坚信不疑。

大选前的一个月，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闭门在家，回绝了一切日常事务，专心撰写4年的述职报告和未来4年的计划。那份7页纸的纲要，标明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7日，盖着“只供DCI（译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英文缩写）阅读”的印章，是密中之密。“目标与转换要点”里讲的故事将会使里根和他的班子大吃一惊。不错，特纳的确一度难以制止那些牛仔和兄弟帮的野蛮冲动，但他最后毕竟还是控制住了他们，其中许多老家伙已经滚蛋了。问题不在这里，更大的问题是CIA患了神经衰弱症。局里的谍报部门——行动处常常胆小怕事，有违上命。它是中央情报局的神秘臂膀，独立掌管海外的工作站和情报活动，一俟总统授权秘密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它负责采取行动。

特纳曾经几次建议采取新的秘密行动，这个局却畏缩不前。有一次，特纳未经与白宫协商，自己写了一张便条来试探行动副局长，询问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取代给美国利益带来危害的三个外国领导人——古巴的费德尔·卡斯特罗、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行动副局长的反应是：不可能，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支值得一提的政治反对派，中央情报局还不太懂得如何去支持一支抵抗运动、一个政党或一位领导人。特纳的想法，不过是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些国家之外的反对团体或个人提供秘密援助。福特总统1976年签署了一项命令，禁止使用暗杀手段，卡特总统再次确认了它。特纳完全赞同这项禁令，可不管怎么说，有些行动人员却疑虑重重，总担心特纳会把他们领到危险的道路上。他们如此前怕狼后怕虎，特纳不由得感到惊讶。不论他如何极力促成，行动副局长总是无动于衷。一想到将插手别国事务，他们就很不自在，虽

然这是他们的本份。是的，当时的确有一部分金钱正在转交给伊朗国外的反霍梅尼组织，但至少在白宫眼里，这不过是惩罚一下霍梅尼，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反抗打下点基础。

特纳也曾向行动处建议，制定一项有限秘密行动计划，物色危地马拉的中间派政治家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必要的话，把一些处于上升状态的危地马拉人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金名单。危地马拉城里的政治动乱此伏彼起。这是中美洲的一种典型政治格局：右翼的军事当局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相对峙。那一年有数百人丧生。在特纳看来，通过提供秘密而又恰当的政治援助，对美国的利益很有好处，这里恰好是这种情况。

从行动处的反应来看，似乎是特纳邀请克格勃出席了上午9点召开的高级会议。秘密行动人员争辩说，这种行动的风险太大，会使中央情报局越出政策允许的范围。这种事情到什么时候都说不清楚。要是他们找到的人是个废物怎么办？要是那个家伙是个“法兰肯斯坦恶魔”，吃里扒外怎么办？要是他们费尽心机找到了一个合适对象，而卡特总统或者别的什么大人物突然改变主意又怎么办？要想翻船可太容易了。反对意见几乎是异口同声，以至特纳到了白宫，连这项建议提都不敢一提。几乎可以肯定，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会赞同某些秘密计划，可卡特总统却喜欢跳着迟疑不决、优柔寡断的华尔兹舞步。事实上，在担任总统期间，卡特一直在布热津斯基描绘的“粗暴的”世界形象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描绘的“温和的”世界形象之间左右摇摆。特纳有次曾私下称卡特是个“反战运动分子”。

上个月，11月14日，特纳在另一份备忘录里写进了他私下的看法。在“白宫”这一标题下，他写道：“冲突的源

泉”。这个表很大，但许多问题都产生和归结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他似乎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为他工作的。一次，在讨论军备控制情报会议上，特纳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布热津斯基对他说：“你不是最高法院，也不是政府部门。你应当明白你是在为谁工作的。”

布热津斯基喜欢原始情报。负责截收外国通信的国家安全局，常常给他提供某些国家的首脑人物的谈话底稿，或者破译出来的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发给本国的政治分析报告。“你看过那份侦收情报吗？”他喜欢这样问人家。特纳觉得布热津斯基犯了低级情报分析家的典型错误，用孤立的电报或侦收材料来解释错综复杂的事件。有许多次，国家安全局送来的是误传误信、妄自尊大或者喜欢吹牛的大使或官员的危言猜测。特纳在“国家安全局”的标题下写道：“单一来源的情报分析是危险的。”

与布热津斯基的明争暗斗是常事，这个人有时把手伸得太长。“你们在苏联没有发展一个间谍，”一次，布热津斯基这样来指责特纳的一位高级助手。其实特纳在苏联发展了好几名间谍，虽然他只相信其中一人是真心诚意的，还有两名失踪了，大概是被杀了——他无法肯定。

从1977年起，特纳呈交给总统的每周三期的情报综述被削减成每周一期，最后被削减成每两周一期。他把这归咎于布热津斯基，有一次他竟然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带的一名研究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比中央情报局强得多。

1979年10月，伊朗国王巴列维到美国就医，两个星期后发生了伊朗人质危机。白宫想让中央情报局在这位被废黜的伊朗统治者的病房里安放窃听器，看看这位身患癌症、机智雄辩的人想干什么。特纳争辩说，巴列维有着与美国公民

一样的权利，依照法律，中央情报局不能在美国境内搜集情报，但有人给他送来了书面命令，他不得不照办，便授权在纽约市立医院的第17层楼的国王的三个私人房间里安装了电子监视设备，不过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把情报看成是一种工具，就象一种管道一样。当工具失效时，当窃听器没有安装到位时，当中央情报局无法预见未来时，恶运就降临了。特纳有时隐约觉得，有时强烈觉得，在他的手下人和他为之效力的总统之间，他是孤独的。

为取得当选总统的理解，他把第二份备忘录的副本递交给了交接组的一个成员，这个交接组为新政府照看中央情报局。备忘录退回来时，上面用铅笔批写着：“建议立即组织精干班子，加强对苏分析，并采取秘密行动。”在特纳列举出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失误的地方，歪歪扭扭地批注着：“放任自流，害怕政治纠纷。”在谈到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的地方，里根班子中的成员批道：“左派分子一个也不能留。”特纳还注意到，在他写着中央情报局“经不起第二次丑闻”的地方，批语是：“气候已变，还会再变。胆小怕事，难成大事。”在特纳说到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组织——最积极活跃的干涉力量的地方，字迹潦草的批语是“必须重建”。太好了，运气不坏，特纳暗自想到。

特纳用完早餐后，他的司机恩尼斯·布朗已经把车开到门前的车道上，准备驱车前往市里向里根汇报。他爬进后座，昨天夜间和今天早晨的报纸和文件卷成一卷摆在了他座位旁。这部由政府配发的深黑色的老牌轿车沿着斯基普威思路向前驶去，接着又转入第123大街，最后加入了早晨的车流。布朗在车队中时进时出，行若游龙。他见缝插针，十分

娴熟地超越了一辆又一辆汽车。

一名警卫手持短枪坐在前排座位上，他是这位海军上将的四名贴身保镖之一。他的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周围，时刻注意着有没有异常的现象。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然而车上的防弹玻璃没有摇下来，所以谁都无法欣赏。这部汽车配备了全套高级保安装置，贴着装甲，还有防地雷地板。

特纳坐在后面思绪颇多，心潮起伏。他很想在这项最富开创性和想象力、能够叱咤风云的事业上干到底。象里根那样的情报工作门外汉，从来没有在联邦政府担任过正式职务，大概根本无法领略个中奥秘。特纳下个月的述职报告也许有助于他继续干下去。

一项最机密的行动是“特别海军控制计划”，简称为“特海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是美国潜艇跟踪苏联潜艇，并在苏联沿海实行监视，搜集情报，有时甚至冒着危险进入苏联领海，或潜伏在苏联港口水下，安放高级电子记录设备或叫“吊舱”，搭接在苏联重要的海底电缆通信线路上。这大概是前所未闻的秘密行动了。潜艇上的全体乘员的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艇上还有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特遣小队。这是海军的骄傲，他们喜欢雄武和大胆的冒险。每一次使命都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一艘核潜艇先驶往预定海域，安放好窃听装置，然后迅速离开。几个星期后，再回到这里，从安在海底电缆的记录装置上取出磁带，带回美国，交给国家安全局。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情报只分发给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中的少数人。有时特纳觉得，与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情报的价值仅仅够本。

然而，他承认，有时潜艇会携带着军事数据满载而归，这是能从苏联搞到量多质优的过硬情报的少数机会之一。

“收获”中偶尔包括苏联官员的内部谈话，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忧虑、谎言和弱点。正如许多成功的情报活动所证明的那样，机会是建立在对方的失误之上的。苏联人自认为海底电缆是不可能被窃听的，因此通信线路上用的是比较脆弱的密码系统，有时根本就不加密。

另一个计划是“英迪戈”。这是一个正在研制中的秘密卫星系统，它将成为未来监视苏联执行军备控制协定的关键手段。“英迪戈”采用雷达成像技术，能穿透云层，也能在夜间工作，这是一般的照相侦察卫星做不到的。这一点在东欧上空特别重要，那里有一种所谓的“恶魔云层”，常常数日或数周不散。

许多最成功的情报搜集行动是由特别搜集组完成的，它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中的出类拔萃的工作人员联合组成的班子，采用最新的技术，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实行窃听。特别搜集组能够实现谍报史上的奇迹，它能搞到在欧洲、中东和亚洲举行的高级会议的记录和主要政治家之间的电话录音，一字不差。它补充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进行谍报活动的不足。

在他那标明“只供DCI阅读”的备忘录里，特纳写道：“更加需要得到盟国和朋友的情报。”特纳认为，搞朋友的情报虽然难以下手，但不得不为之。伊朗国王是美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好朋友，他手下的情报机构——令人恐惧的“萨瓦克”一度是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朗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特纳后来理解到，当时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和中央情报局都糊里糊涂地认为霍梅尼是一个宽厚仁慈、行将就木的教士，可他现在却紧紧地抓美国人质抓在手中。特纳的结论是，没有谁能比你的朋友更会让你大吃一惊。跟不友好的国家打交道反倒

更容易些，因为你事先能料到后果。

受到伊朗革命的震动以后，特纳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扩大打入外国政府部门和情报系统中的间谍网，其中包括一些盟国和友好国家。埃及就是一个例子。中央情报局在埃及采取了一项秘密行动，目的是为恩瓦尔·萨达特总统提供保护，及时揭穿政变和暗杀阴谋；同时也为中央情报局打入埃及政府、搞到它的领导人的情报创造条件。萨达特吸毒，患有多疑症，可特纳对这种官庭流言从未给予重视。不管怎么说，对于萨达特的所做所为和埃及发生的事变，中央情报局是不会感到意外的，这个地方的情况已在掌握之中。

特纳根据情报得知，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法赫德嗜酒成性，有悖于戒律严苛的穆斯林教义。特纳手中也有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的绝密报告，这对白宫很有用，在谈判的前夜更是如此。能搞到关于军备控制的情报就更好了，国家安全局可以据此破译苏联进行导弹试验的某些密码信息。不过，关于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的内部活动的情报却少得可怜，近乎为零，而这正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最急于想知道的，特纳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特纳还没有发现有哪一则情报值得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尽管如此，他还是全力去搜集，因为这是他的本份。在四年里只有一次，他否决了一项海外秘密搜集情报的建议，虽然它只是重蹈上次成功行动的旧辙，但特纳还是认为再来一次风险太大。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特纳的任务是让里根了解所有这些真实情况，还有许多其它内情。里根应对情报活动的全貌胸中有数，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哪些不足。

比如，有一项代号为“擦脖子”的行动，这个代号是随